

● 散文集 ●

大写的 田尚培

田尚培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大写的台湾

田尚培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写的岂湾/田尚培 著——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9.7

(红树林文丛)

ISBN 978-7-5063-4218-X

I.大… II.田… III.散文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1279.5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07212 号

书 名:大写的岂湾

作 者:田尚培

出 版:作家出版社

发 行:作家出版社发行部

地 址: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(邮编:100026)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丛书主编:林文照

出版监审:姜 琳

版式设计:张晓光

责任编辑:王婷婷

图文策划:李新义

印 刷:贵州省包装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6 印张 140 千字

印 数:0001-1200 册

版 次: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978-7-5063-4218-X/I.687

定 价:18.5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汶溪一角：汶溪群山环抱，二水汇流，可谓千古形胜地，天然自生成



岜湾全景：百多年前，这里森林蔽日，虎狼出没，时称老虫窝。清宣统年间，一群四川难民逃荒至此，将这里改名岜湾。



汶溪小学：那座粗壮的老校虽已不复存在，但却永远铭刻在我心中。

图为2009年6月3日回家时与当年的老师陈逸超（右二）、对江小学原校长杨政禄（中）、汶溪小学副校长蒋天华（左二）、汶溪老年学校校长杨政伦（右一）在汶溪小学合影。



2009年农历五月六日，县人大副主任杨代松（后排右三）、宣传部副部长杨通勇（左二）、史志办主任罗辉润（中）、移民局长龙世光（右二）、县文联主席陶通坪（左三）、白市中学校长申春文（右一），陪同我与次儿田景池回家时与母亲合影于老家门前。



在文联成立大会上：县文联成立于1997年4月3日，主持大会的是中共天柱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长蒋太英（左），出席大会的有省文联主席杨长槐、州文联主席杨光磊、副主要席杨念彝、副县长王先游（右）等省、州、县各级领导及与会代表100余人。



1993年夏在武汉获奖时与《今古传奇》责任编辑孟瑶老师合影。



1998年参加省文代会时与杨念彝主席合影



1995年转干时在凯里培训与州文化局长杨光磊等领导合影留念。



1998年参加州文代会时接受电视台采访



2006年参加全省戏剧改编班时与文友合影



1995年夏在遵义参加省作协第一届年会在遵义会议会址留影



2002年参加省文代会与文友合影



2006年春在雷公山与陈登超留影

我的家乡叫汶溪(代序)

我的家乡叫汶溪。

汶溪是我们贵州高原的一块山间盆地，这个山间盆地方圆二十余里，头东尾西，东至白市，西抵渡马。其间有着中寨、对江、三间桥三个很大的自然村落。两条小河分别从渡马和蓝田方向蜿蜒而来，会于汶溪，一路东去，注入清水江。据老人们说，“汶溪”这个地名来源于《水经注》里的一句话：“水有二源双会于一川，俗谓‘汶溪’。”我没看过《水经注》，不知那里面有没有这句话。但汶溪正是一个“水有二源双会于一川”的地方，群山环抱，二水汇流，可谓千古形胜地，天然自生成。

汶溪是一个苗族聚居之地。康熙版《天柱县志(下卷)》载：“明洪武三十年调靖州卫后所移置汶溪寨，因名焉。”汶溪何以成为千户所？后来的《天柱县志》这样记载：“明洪武二十四年(1391年)，境内王汉(苗族)聚众起义，与龙里(今锦屏县属)、五开(今黎平县属)的苗侗人民起义军联合作战。明廷派楚王带兵镇压后，二十五年(1392年)迁靖州卫左千户所于天柱镇守。二十九年(1396年)清水江沿岸苗侗群众反抗斗争又起，三十年(1397年)

又移靖州后卫所设于天柱汶溪,并在远口、江东两地设巡检司进行弹压。”由此可知,此前的天柱与汶溪隶属湖广靖州,明朝廷之所以将原设于靖州的“卫左千户所”及“卫后千户所”先后移置于天柱和汶溪,乃是为了浇灭这一地区的反抗烈火。历代统治阶级实施民族歧视政策,不时逼反民众。这样的歧视,白纸黑字地记载于我县编修于清乾隆时期的《天柱县志》,其中的“天柱县初建县治碑记”有这样的文字:“天柱古荒服地,当皇祖二十有五年,苗丑跳梁,敕命亲藩既大将军率众讨平……盖是时,苗贼猖獗……。”统治阶级素视苗人为“贼”,诬为“苗丑跳梁”,实行残酷镇压。然而血腥的武力压不住民众的反抗。后来“武备渐弛,仍前叛乱。”杜昌炜在其《话说汶溪》一文中说:“明永乐二年(1404),汶溪杨易生、江东杨政朝、蓝田地锁杨朝清三人联合民众造反,为镇压苗侗人民的反抗,朝廷派当时住守靖州府的武将杜海率兵5000余名平叛。”并说“随征军官有乐书溪、姚定发等六人……官军大获全胜。朝廷钦封杜海为平虏将军,世袭镇守汶溪。其他随征军官俱都论功行赏,留守下来。于是在(汶溪)四周大兴土木,修筑土墙,环卫建城。城内除修建了砖木衙署外,还建有玉皇阁、文昌阁、鳌鱼阁、紫金庵、东岳府、东岳庙、飞山庙等‘四阁五庙’。汶溪千户所就建在中寨,以唐家巷、杨家巷、陈家巷为主要街道。百姓按当时的习惯,每姓氏自成一寨而居。寨与寨之间有花街路相通,各寨都修有石门枋。”其实,当时的汶溪千户所还有两个练兵的教场,很大,可惜后来都开成了田,现在的汶溪人仍然把这里叫做教场坪。老人们说,曾有一时期,居住在汶溪的人多达一百个姓。这话不假,大锅饭年代,人们到处开荒,发现许多山头上都遗留着前人留下的瓦片砖头、炉堂灰烬。这足以证明,那时各个山

头都住满了人家,那时的汶溪,的确是一座像模像样的山间小城。

但后来的汶溪衰弱了,衰弱的原因之一,是因为后来撤销了千户所。天柱旧县志载:“汶溪……官军与天柱同。至康熙元年废绝,逃亡所存无几,归并县治。”当时天柱千户所有“镇抚十七员,额军一千二百名。”汶溪“官军与天柱同”,就是说那时驻扎在汶溪的官军也有 1200 名,相当于现在一个团的兵力。这和杜昌炜《话说汶溪》所说的情况虽有些出入,但基本吻合。那时杜海率 5000 名官军进剿汶溪,双方激战,官军虽“大获全胜”,但杀人三千,自损八百,战死的官军肯定不少。然而,朝廷虽然在汶溪“平叛”成功,可毕竟放心不下,于是就让平虏将军杜海带着兵丁“世袭镇守汶溪”,此后形成定制,在很长时间内留有军队驻守,直至康熙元年废绝……归并县治”。当年随着杜海来到汶溪的官军都是汉人,定居汶溪之后,被称为“军三排”,“军三排”平时为民,战时为兵,汶溪就是明代的一个屯堡。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些屯兵与当地居民逐渐融合在了一起,之后便完全彻底同化为当地的少数民族了。

天柱建县于明万历二十五年(1597)。天柱建县后,天汶二所退出历史舞台。汶溪千户所作为当时一个地方的政治、军事和经济中心,存在了整整二百年,当然很繁盛。后来不再是千户所了,自然就衰弱下来。

导致汶溪衰弱的另一原因是天灾人祸。《天柱县志》有这样的记载:“(明)成化十一年(1475 年),清水江沿岸苗民起义,李震、刘敷受命率师镇压,龙永福率乡勇随刘敷进至白岩塘(今白市),被义军杀死。刘敷镇压沿江 621 寨,杀人无数。”汶溪东抵白市,西接渡马,坐落于白市与渡马之间,清水江沿岸 621 寨惨遭

我的家乡叫汶溪(代序)

杀戮,与白市连在一起的汶溪何能幸免?

公元 1855 年即咸丰五年,天柱爆发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农民起义,这就是姜应芳、龙海宽领导的侗苗人民大起义。这场起义起于咸丰五年,终于同治七年,时间长达 13 年之久,曾于同治元年(1862 年)六月分兵三路杀出黔境,攻占湖南会同、黔阳、晃州、沅州等 14 个州县,誓言“直捣京城”。那个时候,反清斗争风起云涌,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打得清王朝手忙脚乱,顾此失彼。黔东南地区不但爆发了姜应芳领导的侗苗人民起义,同时还爆发了张秀眉领导的苗族人民大起义。面对如火如荼反清斗争,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垂死挣扎,血腥镇压。天柱作为姜应芳起义的中心地区,战事尤为剧烈。清廷除派出许多正规部队入黔镇压之外,还组织许多地主团练武装参战,敌我双方不遗余力,仅是天柱县城,义军就三占三退。战事起于天柱,而且姜应芳出征湖南之前在渡马封王拜爵,后来清廷把与太平军作战的 32 营湘军急调入黔,会同 16 营黔军计 15 万之众,合击姜应芳义军。渡马是姜应芳封王拜爵之地,渡马自然要惨遭血洗了。而汶溪紧邻渡马,又何能幸免于难?小时候我常听老人们传说起一个个不忍闻听的故事,说乱军冲进汶溪,见屋就烧,见人就杀。那跑不快的娃娃们,就被那些士兵用梭标挑起来玩耍,之后开膛破肚,取出人肝烧吃。无处躲藏的人们逃进了两个大溶洞里,官军就在两个洞口面前烧起大火,还十分恶毒地在火中加入辣椒,烟火熏烧之下,洞内之人无一幸存。因汶溪战事频仍,累遭兵燹,村民纷纷迁离汶溪,其中“军三排”后人多数迁往大沟溪、北岭、炉山、坡头、干塘、烂木桥等深山老林。真是兴亦百姓苦,亡亦百姓苦。

关于天灾,县志也有许多记载:“崇祯九年(1636 年),天柱瘟

疫盛行,死者无数”。“嘉庆二年(1797年),米贵,每斗价银八、九钱,沿江一带斗米价银一两八钱,人多饿死”。“嘉庆二十五年(1820年)大旱,米贵,穷人无钱购买,死人甚多”。“道光元年(1821年),秋旱,庄稼多枯死,米价昂贵,各地民众饥荒”。“同治二年(1863年),冬旱,牛死颇多,次年七八户共耕一牛,田荒粮缺,死人无数”。“同治七年(1868年),天柱米贵,斗米二千余文,民众卖妻鬻子,饿死不计其数,出现人食人肉”。“同治八年(1869年),米价持续不迭,人以草木根、观音土为食,里民四乡乞食者日以万计”。“民国十三年(1924年),大旱50余天,庄稼枯死,全县饥荒。川军张廷光、黔军杨天爵率部入境,各勒银两一万元,城乡义谷为其食尽,百姓纷纷外出逃荒”。“民国十四年(1925年),大旱40余天,田土龟裂,粮食无收,斗米涨价一千二百文,最高一千六百文。当年瘟疫流行,死者甚多”。——翻开历史认真品读,我们触目惊心地看着,不管是天柱还是汶溪,都是从深重的灾难中走过来的。

汶溪虽然因为种种原因而减弱了当年的繁盛,但汶溪毕竟是一个“水有二源双会于一川”的地方,在人们的眼里,这里龙气充足,乃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,于是就有了一个神奇的传说。说是清朝晚期,汶溪出了个能人。这个能人准备刺杀皇上,于是每天操练弓箭,操练了七七四十九天之后,那个夜晚,他叮嘱母亲不要睡觉,让母亲在鸡鸣之时将他唤醒。母亲等呀等呀,等得烦了,就拍响簸箕,把鸡逗叫了,然后叫醒儿子。她儿子听到鸡叫了,爬起来向着北方一箭射去。可谁知这箭射得太早,还不到真正鸡叫的时候,那皇帝老者还没上殿早朝。结果皇帝老者来到金銮殿的时候,发现他的龙椅上插着一支利箭,就下令严查。这样就查到了天柱汶溪,将这位能人斩了。天柱知县马大人深通地

理，他认为汶溪之所以能出这样的能人，是因为汶溪的龙脉太好。为了防止再出这种能人，马大人就在全县范围内大斩龙脉。对于汶溪，更是大斩特斩。他说汶溪是个肥沃的大瓜堆，那周围的群山就是从汶溪伸出去的瓜藤，那个大瓜堆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一纲千目，纲举目张，非斩不可。于是一路斩下去，一共斩了四十八斩。他先是斩拖枪运，这个名叫拖枪运的地方是一个排坡。据说那拖枪运被他一斩，汶溪巨户罗蜂窝家的鸡鸭在一个早上全都飞到了暗口塘去，再也撵不回家，从此变成了野鸡野鸭，此后这个红极一时的罗蜂窝就衰败了下去。斩了拖枪运，接着又斩斩龙坳。——这虽是个传说，但斩龙坳的确是用人力挖出来的一条山间通道，那通道有着一条用细小的鹅卵石铺成的花街路，据说那就是马大人用来缚龙的锁链。这个传说一真一假。说它假，就假在谋刺皇帝老者的那桩公案上。就算汶溪有着一个想要推翻大清王朝的仁人志士，可即使是当今高科技的远程导弹，有时也有可能出现误差，他怎么就有那么大的法力，居然一箭射到了遥远的京城，并且准确地射中了皇帝老者的宝座？说它真，马大人的确在天柱斩过龙脉。后来我定居天柱县城之后，发现县城南面的一座山上也留下了马大人斩龙的物证。那里也有一条人力挖出来的通道，并且后来有人在那里挖出了两根粗壮的铁柱子。一位老农告诉我说，那两根铁柱子是他父亲挖出来的，出土时已锈蚀得很厉害，但每根还有六十来斤重，他父亲当时卖给了废品收购站。人们说，当年马大人唯恐斩龙不死，最后还用两根巨大的铁钉钉在斩挖过龙脉的地方，那两根铁钉，就是后来出土的这两根铁柱子。用现在的眼光看，斩龙之举似乎荒唐，但在几百年前的那个时代，人们都很迷信风水，斩龙的事不是没有可能。不

要说那时，即使是在科技日益发达的现在，也有不少人算命打卦、求神拜佛，还有着职业性的风水先生。马大人是天柱知县，身为朝廷命官，自然要站在统治阶级一边，防止人民起来造反。事实上，在那个时代，不堪重负的天柱人民已经造过好几次反了。规模最大的一次就是爆发于咸丰年间的侗族人民大起义，起义被镇压之后，天柱又发生了一起民众公然抬着算盘进县衙算账的事件。那算盘是特制的，很大，由几个彪形大汉抬到县衙。去的人一律穿靴子、打火把。衙门里一个当差的人惊奇地问，大白天为什么打火把？人们说，衙门太黑暗，不得不打火把；又问为什么穿靴子？人们说，衙门太烂，不穿靴子进不来。再问为什么抬来这么大的算盘？人们说，衙门贪脏太多，算盘小了算不清。结果把县衙的那些大小头目都吓跑了。再后来，就冒出了汶溪的那个传说故事。于是新来的马大人就大斩龙脉，之后还在县城南面的两座山上分别建了两座塔，美其名曰为天柱增加点人文之气，实则认为天柱“邪气”太盛，“刁民”甚多，要用这两座塔镇住天柱的“歪风邪气”。现在想来，马大人实在有点可笑。但从另一个角度去想，马大人的乌纱帽是朝廷给的，朝廷主宰着他的一切，他敢不为朝廷着想吗？面对着民众的不断反抗，他没别的办法，只好运用他的风水学，这里建座塔，那里斩斩龙。站在官方的立场看，他也算是用心良苦，尽职尽责，说不定还受到朝廷的嘉奖哩。

当年马大人四十八斩下汶溪，斩得最狠的就是斩龙坳。斩龙坳在汶溪北面的高山上，周围几十条山脉真地有如一根根巨大的瓜藤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，就像一条条蛟龙蜿蜒奔来，汇聚于此，向着汶溪朝拜。这里居高临下，举目四望，汶溪尽收眼底。马大人认为这里乃是龙气最为旺盛的穴位，于是狠下杀手。因此有人说，

汶溪后来之所以出不了能人,就是因为那龙脉风水被马大人斩了。

汶溪的龙脉灵气虽然被马大人斩了,汶溪虽然出不了什么能人,可汶溪的人口依然很多。因此,上世纪50年末60年代初的一个时期,汶溪被划为一个乡,乡政府就设在汶溪的杨家祠堂,至今那些上了些年纪的人还习惯性地在那里叫作“乡政府”。遗憾的是,建于600多年前的“四阁五庙”以及诸多文物古迹,皆已无存。我们在汶溪小学读书的时候,还看到一座仅存的城门,那古老的城门就在学校后面,是用一块块青石砌成的,上面长满了青苔杂草。我们还在学校的操场边发现两块古碑,其中一块还隐约可见“贡生董文清”几个字。董文清和杨再举都是汶溪人,是清代的贡生。据老人们说,汶溪还出过一名状元、两名探花、一名大学士。不过那都是明代以前的事,而那之前虽有“天柱”这个地名,却没有“天柱”这个县份,所以就不可能有县志,我们现在看到的县志,最早的是乾隆版。因此关于汶溪在清代或更早之前的许多历史,包括人们传说的状元探花等等,都史无记载,仅为传说而已。后来,就连那座残存的城门也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消失了,那几块古碑也都不见了踪迹。汶溪当年的繁华已彻底消失在时间的风雨中,只有那些时时出土于四周山上的残砖剩瓦,可以佐证汶溪当年的繁华。此外还有一首诗,至今还有一些人可以背诵出来。这就是清道光年间出任天柱知县的俞汝本视察汶溪后写的《咏古城》:“山城遥接小溪流,古城东南尚有楼。数百年前归柱邑,几千亩外割湖州。民安市井居仍旧,人事农桑事未休。倩得此间闲父老,为寻遗迹到村头。”从这首诗里,我们还依稀看到汶溪古城的影子。

不过,时间虽然使得600多年前的古城不再,物是人非,但却无法消融那铁打的江山。600多年后的汶溪,山还是那样的山,

水还是那样的水。在人们的心目中,现在的汶溪仍不失为一个富庶之地、鱼米之乡。

我的家就在汶溪最西南端的一个边角上,那里叫岂湾。

然而百多年前,我们这个名叫岂湾的地方还是一片深林蔽日、虎狼出没、人迹罕至、尚未开发的处女地,被人叫作老虫窝。清宣统年间,一群来自四川秀山的难民逃荒到此,也不知是什么原因,就把这里改叫为岂湾。

我曾祖就是那时从四川秀山逃荒过来的。

据我祖父说,当年他们逃荒贵州时,他和他的五哥都还年幼,是曾祖用箩筐将他哥俩担过来的。可他记得,他们随着一大群人从家乡出发,经铜仁、过玉屏,一路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来,走了十多天,最后才走进了贵州的老虫窝。那是一次悲壮的集体迁徙,背井离乡的人们扶老携幼、翻山越岭、在饥寒交迫中寻找着新的存身之地,不知受过多少苦、流过多少泪,方才走达目的地。四川号称天府之国,沃野千里,到处都是平原大坝,祖辈们为何不去那一马平川的成都平原,而选择了贵州的这个地方?是什么原因迫使祖辈们抛离了心爱的家园?我问过这事,但谁也说不清楚。我是解放后出生的,那时我曾祖、大公、二公都已去世,好几个奶也没了。健在的这些前辈,逃荒贵州时都还小,他们不太清楚当时的情形。我公只知道他们是在清宣统年间过来的。那时候,走过了二百多年的大清王朝已崩溃在即,各地的反清斗争风起云涌,四川是反清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,是不是因为急速恶化的政治环境恶化了祖辈们的生存环境,是不是因为贵州的这片深山老林可以躲避战乱,他们才不得不忍痛抛离家园?祖辈们的选择就这样决定了后辈人的命运,从此我们就成了汶溪人。

我的家乡叫汶溪(代序)

我在汶溪生活了四十四年。站在这片厚重的土地上,我仿佛还能看到那暗淡不了的刀光剑影,依稀听到那难以远去的鼓角争鸣;感觉到手上捧着一卷沉甸甸的历史,身上流动着先人们那种顽强不屈的精神;也见证和体验过太多的酸甜苦辣。汶溪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、一人一事、甚至于一句话、一杯酒,还有那生命过程中的喜怒哀乐、成败得失,不管是他人的,还是我自己的,点点滴滴,丝丝缕缕,一切的一切,都成为了我感悟生命的无字天书,也成为了我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。这片土地给了我生命,给了我真爱,给了我磨难,给了我思想,也给了我无穷的动力。我感谢这片土地,我永远都是汶溪的儿子。这份情感像一坛陈年老窖醉在我心头,让我如醉如痴,欲歌欲诉,于是化为笔墨,形诸文字,这就是《大写的邕湾》。大写者,邕湾即汶溪,汶溪即世界也;而邕湾未必就是邕湾,汶溪也未必就是汶溪;我所见所闻者,也许是人之所见所闻,也可能是人之所不能见所不愿闻者;我所思所想,也许是人之所思所想,也可能是人之所不能思所不愿想者。在我眼里,人,不管你生在哪里活在哪里,不管你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显贵,不管你是经商还是务农,也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,尽管人与人之间在智力才能、社会地位、把握命运、经营人生等等方面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,但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求得生存。邕湾人如此,汶溪人如此,大千世界的人都如此,没有谁可以超越这种生存规律与生存方式。而人的生活原理和生命程序也一样,当生命个体在走完了有限的人生旅程之后,都将回归到无限的大自然之中。站在这个角度上看,其实邕湾就是汶溪的缩影,汶溪就是世界的缩影;而把邕湾和汶溪放大开来,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真实写照。所以我把这个集子叫作《大写的邕湾》。